

山海识东坡 居琼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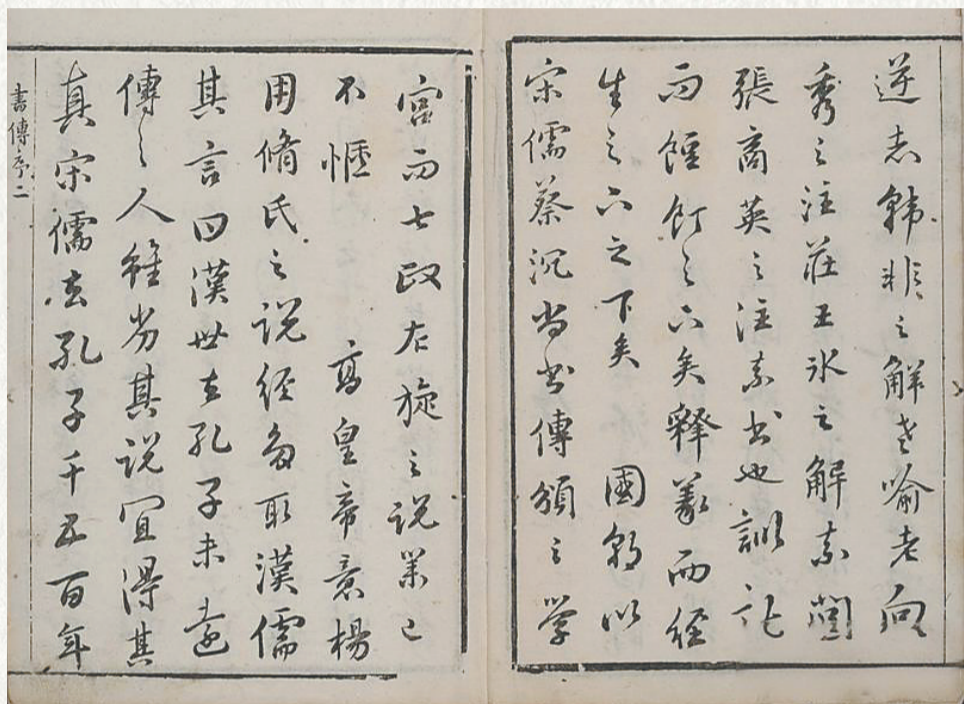
一生笔墨在天涯

苏东坡的“海外三书”

林冠群

谪居海外三年,是东坡一生笔墨生涯的最后时光,也是他学术造诣得以展示的“高光时刻”。在儋州古城(今中和镇)“食芋饮水,著书以为乐”(苏辙语)的苦日子里,他在垂暮之年完成了《书传》《易传》《论语说》三部学术著作,人称“海外三书”。

《书传》是苏东坡居儋期间独立完成的,因为缺少参考书籍,他得靠朋友从大陆寄来一船书以助翻检。《易传》与《论语说》是早年间谪居黄州时初成书稿,到海南才修订完成。三书之成,对东坡来说是一件大事、乐事、幸事。他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告诉朋友:“某年六十五矣,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。或得复与公相见,亦未可知。已前者皆梦,已后者独非梦乎?置之不足道也。所喜者,海南了得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传》数十卷,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。”(《答李端叔书》)



明代凌濛初刻朱墨套印本东坡《书传》内页。资料图

《书传》“以德为先,以民为本”

东坡《书传》到底说了些什么?一言以蔽之:治国理政必须“以德为先,以民为本”。本来流传了三千多年的治国宝典《尚书》也是以此为主题的,但一经汉唐以来历代经学家的多番传述,观点就不尽相同了。“以德为先”尚且略有相通之处,但“以民为本”,则基本上无人能与东坡持此坚定不移的观念了!比如《书传》中论到“皇极”一词,东坡认为这是“大中至正”的儒家学说。因此他释“皇”为大,释“极”为中,要求统治者必须树立“大中至正”的治民法则。而诸儒,特别是明清以来死抱封建僵尸的学者,都将“皇”释为“皇上”或“皇权”,于是本应为民众谋利益的“皇极”却变成了皇帝操弄权柄,压制民众的统治手段了。(见《洪范》“皇极”一节)

在《多方》一篇中,东坡的传文有:“丽,著也。奠民之居,王政之本。民不土著,虽尧舜不能使无乱。”东坡释“丽”为附着的意思,认为统治者必须认真解决土地问题,使民众能安居乐业,这才是“王政之本”。可是,尽管历代注家对“丽”字有多达十余种解释,却没有一种与他相同。

东坡《书传》在北宋末年不许印行,但此书一直以手抄本流传,直至明末始有正式刊本。

《易传》朱熹排斥 纪昀肯定

《易传》是苏东坡纯粹讨论儒家哲学思想的专著。《易》作为儒学中最重要哲学经典,传承到北宋时期,迎来一个崭新的传习阶段。而这个时期,作为学界主流的思想是以程颢、程颐为代表的天理心性说。他们以一个超意识的“天”作为一切变化的主宰,阐述

《论语说》 钩沉辑佚,仍可窥斑见豹

《论语说》最初是东坡谪居黄州时所作,当时写成后曾手抄一份寄呈朝中大臣文彦博,但最后因所谓“党争”的政治局势影响,此书还是失传了。另据四川大学马德富先生的看法,《论语说》之所以失传,是因为明代科举考试中只许采用朱熹的《论语集注》为必读之书,且因东坡的《论语说》包含不少非议儒学道统、批评孟子等“离经叛道之语”,所以被“日益森严的正统儒学所摒弃了”,至今所见是后人辑录的残本。

尽管如此,从东坡自青少年时起,兄弟俩便以父亲苏洵为师的学术传承来看,也可知在《论语说》中必定有不少观点与众不同,别有新解。比如,他年轻时所作的《中庸》三论,便力证程朱学派对于孔子学说的曲解。苏轼认为,《中庸》之论,是孔子所著未完的“遗书”,其要旨不是谈天理性命而是着眼于人的情志品性,通过内省自修的途径(道),诱导人的德性达到最完美的极境——至诚。

程朱学派却认为:“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。”(朱熹《中庸章句》)引孔子“过犹不及”为据,主张做人处事应以“适中”状态为最好。而东坡却就此批评道:“此昧者之论也。故世俗之学,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,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,是近于乡愿也。”

什么是“乡愿”?即做事情貌似不偏不倚,对是非模棱两可的态度与行为方式。至今仍有学者认为孔子的“过犹不及”讲的是处在过与不及之间,也就是“中庸”,却忽略了东坡的“中庸论”说的是一种“至诚”的精神境界。

东坡的《论语说》虽然已经失传,但经后人精心钩沉辑佚,也可以“一孔窥全豹”,从有限的片断中了解全书的中心意思与价值取向。

苏东坡北归渡海赴康州时,“船宿大海中,天水相接,疏星满天。起坐四顾太息,吾何数乘此险也?已济徐闻,复厄此险乎!过子在旁酣睡,呼不应。所撰《易》《书》《论语》皆以自随。世未有别本,抚之而叹曰:‘天未丧斯文,吾辈必济!’已而果然。”假如当夜果有风涛之险,“三书”俱失,则时至今日,世上再也见不到这“三书”的真相了!“天未丧斯文”,毕竟东坡不仅是中国且是世界第一等的伟大文人。图



中国书店再版的《钦定四库全书(东坡易传)》。资料图